

# 大夏大學的誕生與復校

倪文亞

我們母校大夏大學創校到現在，已經六十年；今日回想六十年前之所以離開廈門大學，因此誕生大夏大學。這中間的何去何從，有一中心思想與原動力，那就是熱愛我中華文化，和同情國民革命。

現在先從「離校」說起；因為「離校」，才有「建校」。六十年前六月一日，廈門大學學潮陷於無法解決情態時，學校當局蓄意提前放暑假，以便學生離校後得以從容處理。結果，我們十四名學生代表到達上海，其他同學分別回家後，學校將五十一名同學整批開除學籍。這些開除學籍通知書，約於離校一個月後纔分別收到的。這些被開除的同學，在校時都是學校視為優秀的學生。平心說，無論學業成績，平日操行，他們都可當之無愧。

學校有此蓄意已如上述，同學們也覺得，學潮到這田地，已不可能很快的得到解決，於是決定全體離校，並發表離校宣言，訴說這次學潮的癥結所在，在一片無可奈何的心情，希望博得社會的同情，促進學校當局改革校務，確是用心良苦，而且是積極的。本人謬承同學推舉，起草這一離校宣言，現雖時隔一周甲，我仍清楚地記得

在一天的晚飯之後，我匆匆地寫完這篇稿子，當經全體同學通過。說來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好笑，此刻我竟仍能將那篇宣言最後一段，全部一字不差地背出來，現在照錄如后：

「總之，此次學潮，如不謀徹底解決，則廈大將萬劫不復。陳嘉庚兄弟如果執迷不悟，聽任林文慶貽誤青年，則早日之毀家興學，純是欺世盜名。陳廷庭等率工人五百餘人，圍打學生，而竟逍遙法網，則廈大決非人跡所應到的地方。我們既有良心，我們既有好惡。在這冷酷的孤島上，既不能有所為，選擇適宜地點，繼續與惡勢力奮鬥。如果奮鬥而勝利，我們決全體返校，繼續來學的初衷；萬一奮鬥是失敗，則非我們絕廈大；乃廈大先絕於我們。海闊天空，何處不是我們求學的地方？仰天一笑，我們不再屈服於強權之下了。」

此刻重唸前文，多少有些自嫌年少氣盛，所以六月一日我們被圍困在學校禮堂中起草的電稿，丟交同學拍發上海民國日報的電報，措詞也依然記得，不想再提了。

時隔十七年後，對日抗戰正酣之際，廈大遷到閩北長汀，我奉命由重慶到閩浙兩省，為三民

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代表大會監選。廈大分團主任是由薩校長兼的，我曾出席由薩校長主持的歡迎會，目觀沿途的歡迎標語，大幅紅布的歡迎橫額，的一位在廈大畢業，留美回來在廈大任總務主任的當年同班同學，彼此見面倍覺親切；這是離校後第一次回到廈大，我被邀講了話。我在心的深處，十分虔誠地默祝，希望廈大能在安定中進一步，在學術界建立地位，尤其希望對東南亞僑胞提供較多的貢獻。抗日勝利後，三十六年初夏，我因公赴廣州，因機場跑道故障，臨時在廈門停宿一宵，從貼在旅館的佈告上，我看到當年的廈大黃天爵同學正在任廈門市長。因為來去匆匆，我祇在佈告前低徊一陣而已。三十八年一月離開大陸，幾次在金門古寧頭西望，我比一般面對遙遠鏡的人多一層離情。

以上說了當年離開廈大的經過，現在簡述大夏的誕生。這先後兩事，其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貫的，就是對我中華文化的熱愛，對國民革命的同情。

我嘗以爲我們母校大夏大學的發軔、成立、光大，以及蒙難，而終必光復重建，和中華文化、國民革命，實痛痒相關，同其休戚。回溯廈門

大學之所以發生學潮，這和當時的廈門，就文化水平而言比較落後有關。一個最高學府不是孤立的，她需要相當的文化環境；一個初創的大學，尤其需要。陳嘉庚以「校王」身份，君臨廈大，這倒不必管他；遺憾的是他所安排，從而延攬的教授和重要職員，對西方科技不少學有專攻，但對我國固有文化實嫌素養不够。而對當時一般青年學生，痛恨軍閥政客的禍國殃民，因而嚮往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的心情，實在隔膜得很。可以說，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思想主流脫了節。也可以說，「五四」以後的文化運動和中國國民黨改組，把當時我們師生間截為兩段。用現代的術語說，這是「代溝」。但這並不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在校裏有什麼活動而來，我們在廈大始終沒有碰到一個國民黨黨員。我們這些人加入中國國民黨都是到了上海以後的事。所以廈大學潮的近因，當然是同學對學校措施不滿，再加陳廷庭率工人五百餘人圍打學生，纔火上加油，不可收拾。但當時有一看不見的重要因素，在同學心中普遍存在，幾乎無法遏止的心情，是青年人對我中華文化的熱愛，對國民革命的同情和實踐。這在當時最明顯的證據，就是當我們於六月一日被校工圍困在禮堂裏，拍出去的唯一電報，就是拍給上海民國日報。這是在上海的黨報，我們都明白這是一家很窮困的報，無論規模、發行額，比起申報、新聞報來，都不可同日而語。

更值得指出的，大夏大學的校名，在我們離開廈大前就確定了的。意思是光大華夏，充份表

露了我們對民族精神、文化思想的狂熱。

大學之所以發生學潮，這和當時的廈門，就文化水平而言比較落後有關。一個最高學府不是孤立的，她需要相當的文化環境；一個初創的大學，尤其需要。陳嘉庚以「校王」身份，君臨廈大，這倒不必管他；遺憾的是他所安排，從而延攬的教授和重要職員，對西方科技不少學有專攻，但對我國固有文化實嫌素養不够。而對當時一般青年學生，痛恨軍閥政客的禍國殃民，因而嚮往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的心情，實在隔膜得很。可以說，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思想主流脫了節。也可以說，「五四」以後的文化運動和中國國民黨改組，把當時我們師生間截為兩段。用現代的術語說，這是「代溝」。但這並不是由於中國國民黨在校裏有什麼活動而來，我們在廈大始終沒有碰到一個國民黨黨員。我們這些人加入中國國民黨都是到了上海以後的事。所以廈大學潮的近因，當然是同學對學校措施不滿，再加陳廷庭率工人五百餘人圍打學生，纔火上加油，不可收拾。但當時有一看不見的重要因素，在同學心中普遍存在，幾乎無法遏止的心情，是青年人對我中華文化的熱愛，對國民革命的同情和實踐。這在當時最明顯的證據，就是當我們於六月一日被校工圍困在禮堂裏，拍出去的唯一電報，就是拍給上海民國日報。這是在上海的黨報，我們都明白這是一家很窮困的報，無論規模、發行額，比起申報、新聞報來，都不可同日而語。

可是「大夏大學籌備處」牌子掛起後，進行確實不遺餘力，原任教授的幾位先生固不消說，孫亢曾、何縱炎諸同學的工作績效特別卓著。我們編行「血淚」週刊，作為民國日報的副刊，上面提到的那幾位同學貢獻很多。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前輩先生，對我們熱情的照顧指導，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。吳稚暉先生常到我們住處來，而且每次都坐談很久纔去。他對我們這羣青年人的革命精神十分讚揚，可是他總誠摯地對我們說：「我們當然極歡迎你們參加我們革命行列，但現

在仍希望你們先致力讀書，將學業完成後，再來從事實際工作。」諸如此類的親切教誨，既是鼓勵，又極關懷。前輩風範確是不凡。有一次他老人家坐在床沿上（因為椅子不夠），將手指扣入茶杯柄，殊不知這茶杯柄的上端是斷缺了的，杯裏茶水全灑在老人家的長袍上，他怡然自得，只是和我們好笑而已。出門時，我們送他，有意替他雇輛人力車，誰知老先生一向不坐人力車，挾着一柄雨傘，早已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了。

到了上海以後，原在廈大任教的幾位先生，以及十四名學生代表，在經費困難到處碰壁的情況下，大家抱着毫不動搖的信心，積極開始籌備大夏大學。大家的志氣十分昂揚，可是真的百分之百的其始也簡，簡得好笑。舉例言，那位管總務的周先生，原是省立高中有名的歷史教師，寫得一手極工整的柳體字，他記下每一筆的開支，在那本收支簿上，他一筆不苟地多次記下「付開水銅元一枚」，就足見一斑了。十四代表中有位江蘇籍同學，常穿的白汗衫變成淡灰色，背後還有大小不同的破洞，汗臭實在逼人，但他和我很講得來。夏天上海奇熱，而且蚊子多，他幾次拖我上永安公司天韻樓最高層，不是看熱鬧，而是去乘涼，如此坐到打烊纔走。這些趣事，想起來真是好笑。

可是「大夏大學籌備處」牌子掛起後，進行確實不遺餘力，原任教授的幾位先生固不消說，孫亢曾、何縱炎諸同學的工作績效特別卓著。我們編行「血淚」週刊，作為民國日報的副刊，上面提到的那幾位同學貢獻很多。在上海的中國國民黨前輩先生，對我們熱情的照顧指導，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。吳稚暉先生常到我們住處來，而且每次都坐談很久纔去。他對我們這羣青年人的革命精神十分讚揚，可是他總誠摯地對我們說：「我們當然極歡迎你們參加我們革命行列，但現

在仍希望你們先致力讀書，將學業完成後，再來從事實際工作。」諸如此類的親切教誨，既是鼓勵，又極關懷。前輩風範確是不凡。有一次他老人家坐在床沿上（因為椅子不夠），將手指扣入茶杯柄，殊不知這茶杯柄的上端是斷缺了的，杯裏茶水全灑在老人家的長袍上，他怡然自得，只是和我們好笑而已。出門時，我們送他，有意替他雇輛人力車，誰知老先生一向不坐人力車，挾着一柄雨傘，早已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羣中了。

那年秋季全國大專院校開學的時候，艱難締造却充滿朝氣的大夏大學，在上海小沙渡路開學了。學校董事長王伯羣先生，校長馬君武先生，都是黨國元老。上海人文薈萃，甚多知名學者應聘來校擔任教席，他們不少對班上學生說，他以他的，在五卅慘案，國民革命軍到達上海，北洋遺孽李贊章屠殺無辜時，大夏同學曾英勇地參加國民革命行列，流血犧牲，但平日間師生合作無間，樸質好學之風，確屬難能可貴；也着實不負吳稚暉老先生的殷殷教誨。

之後，由小沙渡路，而膠州路，不出數年，便在滬西梵王渡建立佔地廣闊、建築宏偉的不拔基礎；無論學術水準，校舍設備，都屬上乘。同學人數，在當時即數以千計。

大夏在梵王渡建校後，不僅基礎已定，而且規模宏偉，已如上述。可是就學校經費情形言，仍是入不敷出，這是因為需要不斷的增建校舍，延聘好教授，充實設備，以適應聲譽日隆的好景逼人。這境味够苦，却十分迷人。辦私立學校會積錢，在大陸上幾乎不會聽到過。

那時大夏校內，歐、王、傅、魯、吳和我六

的人事、經費，各方聯繫，以及重要興革，尤其那時學校正在積極謀求發展，經費籌措，煞費周章。諸位校董也多所盡力，但距學校希望於諸校董者仍屬很遠。那時上海有位最有名的聞人，曾慨允為大夏向銀行貸款負責擔保。貸款自然清償，不短分文，但不能不令人有「禮失而求諸野」之慨。我們六人這一定期聚會，時間向無限制，可以說無所不談，常常談至深夜總散。我那時喜說：「悲觀透頂」，有一晚上王祉偉先生於聚談中拿起筆來寫了兩句：「透頂悲觀求董事，支持大夏靠流氓！」大家都十分激賞。祉偉先生一向才氣縱橫，寫這兩句和激賞這兩句的人，都絕非有意損害什麼人，但確確實實盡書生報國的苦水，豈僅為紀念大夏而值得一提。

可是話要說回來，以大夏當時的基礎，再加以全校師生的奮發進取精神，如能長期安定發展光大，毫無疑問對我國高等教育必能提供無可衡量的貢獻。痛恨日本軍閥侵華，京滬相繼淪陷，母校不惜犧牲，擁護抗戰到底國策，隨政府西遷，雖艱苦備嘗，但百折不撓，始終弦歌不絕；而且一切水準不落人後。日本軍閥給予我人的深仇痛恨，真該永遠不忘！

勝利後，我會因事赴滬，去過學校幾次，目睹一切正在積極復建中。時正萬方多難，校務自多艱辛；但母校仍一貫地積極充實擴展，不愧為東南復建最速的大學之一。嗣以共匪擴大叛亂，上海陷落，母校亦遂陷入魔掌！

由此可知大夏對我中華文化、國民革命的熱愛和同情，絕非徒託空言，確是坐言起行，貫徹

始終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大夏大學和中華文化、國民革命，常同興替，同休戚。老實說，我們雖飽經憂患，却引以自豪。

來臺後，校友中時有在臺復校之議，這當然是一家所一致期望的。但政府對大陸衆多大專院校在臺復校問題，高等教育量的擴充問題，不能不作政策性的考慮。又所謂復校，在此地實乃創辦；創辦一所大學所需的經費、土地，至為浩大。而誰能，並願以全部心身專一致力於校務，尤其特別重要。大陸上許多私立大學都有很多很優秀的校友在臺，很少聽到在臺復校的原因，大致可能都是在此。

六十年前往事，今天細說從頭，實在說不勝

倪文亞博士浙江省樂清縣人，曾任大夏大學、暨南大學教授兼系主任。現任立法院院長。本文因排印時間迫促，未能送請倪先生核校，如有錯誤容再更正——編者

# 褚問鵠著 仰天長嘯集

定價新臺幣柒拾五元  
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為名作家褚問鵠女士精心傑作，談古說今，生動翔實，精彩百出，美不勝收，要目有：王陽明的異代知音。羅卓英將軍和文天祥題壁詩。國殤陶衣雲。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所最難忘的人。桂林山水憶前遊。孤山探梅。一堤烟柳憶南湖。楊貴妃之死。關於褚遂良的籍貫問題。夏憶鶯湖。吾愛吾廬。山園拾趣。我武維揚。為滿籍女詞人說幾句話。周道如的下場。西施失踪之謎。一劑藥方。故鄉的早高。埋香埋玉總多情等篇，卅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柒拾伍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

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按址寄書。

說。此刻祇是簡述此中的主要環節，以及少年時一些好笑却十分真實的回憶而已。人道一周甲歷時很久，我却覺得往事歷歷猶如昨日。時光不會倒流，少年也不可再；好在當年凌厲無前的勇氣，和青年人的歡欣心情，同學們大都不減昔時。

。我們中華文化千古常新，國民革命終必得到最後勝利。我們母校大夏大學之誕生，原即立基於此，我們有理由確信，母校大夏大學一定能够復校，而且更宏偉，對國家民族有更多更大的貢獻。